

## 导致动荡的三大原因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阿拉伯世界最近发生的动荡无疑具有复杂的起因。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席卷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此次金融危机自 2007 年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经金融、货币渠道传导,引起冰岛破产、迪拜危机、南欧震荡,然后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延长、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抗议活动。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断裂。在现行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高度依赖经济景气的旅游业显然是最弱的环节。正是全球危机导致了失业率的长期高企,减少了欧洲人的度假,使依赖欧洲游客的突尼斯经济就像沙滩上的房子摇摇欲坠。加之大量失业的打工者回到本土,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的冲击。这就是突尼斯一个大学生小贩无望自杀的背景,是迫使更多无望者走上街头的背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依附性经济基础,在全球危机下表现得尤为脆弱。一旦国家的经济基础垮掉了,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和各种上层建筑也将不可避免地坍塌。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是“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支配着“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这种依附性首先是政治屈辱,是制约阿拉伯文明复兴的障碍。这种依附性也导致了世界性不平等,在平时,南方国家的依附型经济向中心国家输送着大量利润;在危机时刻,依附型国家就成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国家当然会转嫁危机。而实际上,在危机传导的链条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美国多印的 2 万亿美元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流动性泛滥,使各类资产的价格高涨,尤其是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价格暴涨,而

以食品价格高涨为特征的高通胀恰恰是中东和北非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二是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中,阿拉伯世界处于边缘地带,这些从殖民地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南方国家存在着经济结构单一的印迹,难以形成支撑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综合性产业基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下,这些国家只能沿着所谓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前进,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并承担更高的发展成本。这些在上层建筑中就表现为存在与普通国民利益相悖的具有买办官僚特征的统治集团,它们贪污腐败严重,行政效率低下,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等大量社会矛盾。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被掩盖起来。特别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其全球战略利益,从金钱、武器装备和政治上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使其能够运转如常。但是当危机来临时,这些国家的原有社会矛盾被激化,而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导致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问题更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在充满愤懑的社会基础之上,“维基解密”揭露的总统家族奢华生活和官员腐败成为事件的导火索,只需要一颗火星,就点燃了熊熊大火。

三是新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此次阿拉伯地区的社会动荡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还因为有许多新技术的介入改变了社会政治运动的形态。从历史上看,技术对社会运动的革命性作用并不鲜见。印刷术曾经引发过基督教革命,报纸的广泛传播催生了欧洲的社会革命,罗斯福利用无线广播进行“炉边谈话”动员人民介入战争,肯尼迪通过电视与公众沟通,而奥巴马则是运用微博和网络与选民交换意见。人类作为社会性生物,其行为通常会受到信息的影响甚至左右。新传播技术的出现,就像在军事领域出现新武器将改变战争形态一样,或迟或早总会改变政治运作模式。而这次发生在阿拉伯地区的动荡,在十几天时间就能迅速颠覆存在了几十年的政府,新技术的能量确实不容小觑。在新的信息技

术协助下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这些新组织不同于西方式政党,也不同于列宁式的小组,它们有的是得到国外基金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只是善于利用网络工具的年轻人。网络与“脸谱”、“推特”等新型信息工具的结合,轻易实现了大量信息实时的平面传播,这就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的运动得以在瞬间完成。这些善于利用信息技术的新型组织,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以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表达个人政治诉求、与他人进行广泛交流的媒体。这些技术工具可以广泛传播类似“够了”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在短时间营造新的社会共识,实现对特定政治人物和特定目标的聚焦式压力。这些新信息技术还可以迅速消除原有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契约,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网络中平等的节点,瓦解金字塔结构的传统“主控”社会,造成“技术性无政府现象”。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政治理念不同,这次政治动荡借助于新技术工具,已经展现出“一切人影响一切人”的现代政治特征。这场运动预示着金钱与暴力构成的传统政治权力正在被信息技术解构,信息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结合可能构成了未来社会权力新结构。由哲学理念、价值观、社会意识、概念创意等精神要素建构的“政治软件”,将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政府、政

党及其领导人如果不理解当代信息技术对政治正在产生的深刻影响,就会丧失编制“政治软件”的主导权,将在网络政治的对决中溃败。

通过对上述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引起此次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根源尚未消除。阿拉伯国家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随领导人更换而化解,社会动荡有可能成为长期的动乱,因动乱引起的石油价格上涨会把危机向制造业国家和消费型经济传导,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甚至把全球拖入经济滞胀的泥潭。因此,危机将继续深化,世界已进入动荡期。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的抗议活动证明,所有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同时,这亦证明新技术开启了社会运动的“潘多拉盒子”,将是对所有国家社会治理的新考验。

就像在经济领域,我们现在既要懂得实体经济,也要重视虚拟经济。同样,在政治领域,我们要解决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反腐败等实体政治中的问题,也要关注网络、电讯等虚拟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就像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有破解动乱发生原因的认识能力,也需要有把发生动荡的道理说清楚的本领。○

## 当前中东剧变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发生在突尼斯西部一个小城镇的一起城管粗暴执法事件,竟然在中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连串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或倒台或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不能不发人深思。综合研判可以发现,这场剧变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是阿拉伯世界寻求民族复兴的一次新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拉伯世界深陷危机,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干涉频繁,先有英法殖民,后又呈美苏对抗,但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放弃寻求民族复

兴的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民族民主革命”席卷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曾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大国(埃及)和伟大领袖(纳赛尔)身上,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曾经盛极一时。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又掀起了“伊斯兰复兴”浪潮,阿拉伯人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出路。但两次复兴的尝试均未引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这次以突尼斯、埃及“社会革命”为标志的阿拉伯剧变是阿拉伯复兴的第三轮探索。